

從產婆到男性助產士： 評介三本近代歐洲助產士與婦科醫學 的專著

蔣竹山*

1. Hilary Marland, ed., *The Art of Midwifery: Early Modern Midwives i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xvi + 234 pp.
2. Adrian Wilson, *The Making of Man-Midwifery: Childbirth in England, 1660-177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xii + 239 pp.
3. Nina Rattner Gelbart, *The King's Midwife: A History and Mystery of Madame Du Coudra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xi + 347 pp.

一、前言

* 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班研究生

近年來有關「女性與醫學」的課題，已逐漸受到西方醫學史界的重視，德國醫學史家 Fohanna Geyer-Kordesch 於 1993 年的一篇研究回顧即透露出這種特色，舉凡女醫師、護士與公衛運動、助產術，都是當前學界討論的焦點，其中，又以產婆/助產士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¹ 據英國著名醫學史家 Roy Porter 最近的研究，十八世紀啓蒙時代「醫學科學」的一項重大改變是「分娩」(childbirth)行爲與技術的改變(Porter, 1997, pp. 273-274)；而女性主義醫學史家 Ornella Moscucci 更明確指出，十八世紀婦科醫學的最重要發展是助產士開業醫 (midwife practitioners)階層的興起，及婦幼疾病被納入正統醫學範疇(Moscucci, p. 10)。Porter 與 Moscucci 所說的這些特色，正是當前醫學史家汲汲欲探索的主題。

其實，西方有關產婆/助產士的研究已有悠久的傳統，自十八世紀英國首次出現男性助產士以來，就陸續有相關研究出現，在當時有一批醫學作家、醫生及學者專門針對此新興現象做了相當完整的記載與研究。近年來，西方醫學史界——尤其英國相繼有重要的相關專著問世，主要就是依靠這批重要的資料，以 Adrian Wilson 爲例，他在 *The Making of Man-Midwifery: Childbirth in England, 1660-1770* 一書中就引用了百餘種十八、九世紀的助產士史料。從 1970 至 1990 年，有兩位醫學史家——Jean Donnison 與 Ornella Moscucci 的著作相當受到西方學界重視。Jean Donnison 於 1977 年出版的 *Midwives and Medical Men: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Childbirth*(Donnison, 1977)，² 可算是早期經典名著，該書主旨在探討十九世紀以來分娩專業化及醫療化出現後，產婆和男性醫者間呈現哪些競爭局面？該書不僅探討過去產婆的歷史，更關注近代結合女性主義的助產士運動發展。1990 年代初期，女性主義醫學史家 Ornella Moscucci 則透過十九世紀英國的婦產科探討女性與醫學的關係(Ornella Moscucci, 1990)。³ 限於

1 Fohanna Geyer-Kordesch, "Women and Medicine," in W. F. Bynum & Roy Porter, eds.,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1(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888-914.

2 本書曾於 1988 年再版，1993 第三版。

3 本書有一章〈男性助產士與醫學：專業的源起〉，專門在探討十八世紀產科革命以來助產士的歷史演變。該章的主要論點大多根據 Adrian Wilson 早期的助產士研究成果。

篇幅因素，這兩位的作品不在討論之列。

1990 年代以來，醫學史界將焦點上溯至男性助產士正式誕生的時代——十八世紀中期之前的英國及歐陸國家。在諸多研究中，以 Adrian Wilson⁴ 的研究成果最受注目，他的 *The Making of Man-Midwifery: Childbirth in England, 1660-1770*（以下簡稱《男性助產術》）可說是目前為止，最具代表性及啟發性的著作。目前國內對「女性與醫療」史的研究方興未艾，有關西方醫學史這方面研究概況的引介更乏人問津，本文即以此書為中心，配合 Hilary Marland 編的 *The Art of Midwifery: Early Modern Midwives in Europe*（以下簡稱《產婆的技藝》）及 1998 年 Nina Rattner Gelbart 剛出版的 *The King's Midwife: A History and Mystery of Madame Du Coudray*，透過重點介紹的方式，呈現國外產婆研究的最新概況，並進而思考這些研究對我國「女性與醫療」史研究的啟發。

二、女巫或女醫？產婆形象的再思考

1993 年醫學史家 Hilary Marland 集合了歐美醫學史、婦女史研究者 (Doreen Evenden, Nadia Maria Filippini, Nina Gelbart, David Harley, Ann Giardina Hess, Helen King, Mary Lindemann, Hilary Marland, Teresa Ortiz, Merry E. Wiesner) 出版了論文集 *The Art of Midwifery: Early Modern Midwives in Midwifery*，此書的出版戳破了史學家對十七世紀前產婆污名化形象的迷思。在此之前，受到十六、七世紀以來男性的醫療者及助產士對產婆的攻訐影響，我們對當時產婆的印象不外乎是一些上了年紀、中下階層、已生育過、未受正統醫學訓練、無法接生難產、及與女巫沒有兩樣的已婚老婦或寡婦 (Wilson, 1995, pp. 31-33; Harley, 1990, pp. 1-26)。然而，1990 年，研究十七世紀產婆與女巫關係著稱的 David Harley 就指出，將產婆與女巫所做的聯想，根本就是歷史學家「想像的作品」。近來，女性主

4 Adrian Wilson 目前是英國 Leed 大學歷史、科學哲學及哲學系講師，他從 1980 年代開始就著手十七、八世紀英國「分娩」及嬰兒照護歷史的研究。

義史家 Ann Llewlyn Barstow 更以「厭女主義」觀點重探近代以前歐洲獵殺女巫運動的真相，他指出十六、七世紀女性治療者被污名化或魔鬼化的一個解釋是教士們妒忌產婆篡奪了他們的角色因素作祟。⁵

大致而言，《產婆的技藝》有以下幾項重點：

第一、產婆的污名化形象由來已久，須透過全面性的探討才能一窺產婆全貌。編者在導言即明確指出該論文集的兩個主旨：一是將關注焦點放在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的歐陸地區（英、法、德、荷蘭、義大利、西班牙），企圖挑戰長久以來有關產婆的各方面根深蒂固觀念（生活、工作、社會身份、公眾形象）；另外希望透過不同案例能夠勾勒出近代歐洲產婆的行醫圖像。他們發現近代對產婆而言既非「黃金時期」；亦非是由年長、缺乏技術的老婦對無助女性進行助產術的時代。傳統視大部分產婆只是靠著基本經驗及訓練來執業的「不學無術的產婆」，已多次在此書被證實是毫無根據的觀點。本書的共識是，從產婆的開業、技術、能力、社經背景、教育、工作訓練、資格、公共功能、及形象等方面來說，近代西歐各國的差異極大(Marland, 1993, pp. 1-2)。透過不同地區的研究，編者 Marland 歸納出產婆的一些共同特質：大部分是成熟女性、已婚或寡婦、中等階級，工匠、貿易商或農夫之婦；通常她們會當子女已成年才出來執業，並透過師徒制管道獲得訓練。開業對產婆家庭而言，雖非絕對必要，但仍是有益的額外收入。此外，書中許多論文透露，直到十八世紀，產婆才有較高的社經地位來進行助產術。

第二、《產婆的技藝》強調，採取以競爭的觀點來看產婆歷史時須特別小心，當面臨男性產科開業醫的挑戰時，產婆無疑是輸家。產婆的歷史比我們認為它是從十七世紀或十八世紀開始沒落還要複雜。男性助產士之所以涉足接生一職，不應只視為是社會的接受及有潛在的利益，或擁有新的器械及社會魅力；甚至不應有男性助產士最終已包辦一般性接生的看

5 透過十五世紀一部充滿了深刻的男性嫉妒心作品——*Malleus Maleficarum*（《女巫之錘》），Barstow 解釋這是因為所有的男人（包括父親）都被擋在產房之外，因此他們只能憑空猜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事(Wilson, 1995, pp. 25-45; Barstow, 1996; Purkiss, pp. 100-101)。對此書有興趣者，可參見李貞德的書評，《新史學》10.3 (1999.9)。

法。例如，Doreen Evenden⁶ 的研究指出，即使十八世紀英國的南、北方鄉村地區男助產士已負責許多接生工作，但半世紀前的倫敦仍對產婆有高度信任。1750 年代左右，男助產士已開始為南方鄉村的教友派(Quaker)信徒接生。David Harley 的解釋是，這涉及許多因素：男助產士工作範圍的開拓，誇耀有較佳的技術及教育水準，優良產婆的缺乏，顧主與產婆間對品味看法的社會代溝擴大。類似的情形亦在北方鄉村進行，該地的男性開業醫已取代產婆成為接生專家。

第三、上述英國的特色並不能代表歐陸其它地區。例如 Mary Lindemann 提到十八世紀德國城鎮 Braunschweig 的例子，當地作了許多努力在使產婆不過問產科。Hilary Marland 認為，荷蘭的種種有關產婆的規訂是朝著控制及監督方面配合，而非排除或降低她們的工作量；相反的，她們擔任一般性接生的角色一直被確認到十八世紀末。產婆們所關心的是種種權宜問題，而非向男性產科開業醫挑戰——她們不怕去抱怨她們的薪水、身份、社區義務、公民權、劣質訓練、師徒關係、或假產婆搶飯碗。產婆們的工作一方面由這些問題所形塑；另一方面則受到城鎮權威及醫學階層的左右。Nadia Filippini 指出，由於宗教的因素，產婆在義大利享有較高的地位，她不僅要為新生嬰兒進行聖餐和洗禮；而且扮演了在社區中傳授女性性知識的角色。這種特色在鄉村尤其明顯，產婆直接由教士所任命，到了十八世紀，這種關係幾乎完全制度化。但十八世紀中葉，由於受到啓蒙思潮的影響，政府開始介入許多公共事務，例如降低嬰兒死亡率，因此改善接生技術為當務之急，在 1757 至 1779 年間，威尼斯地區就設立了十三所的助產學校。此後，產婆的職權開始降低，而產外科醫師的接生角色則大幅提昇。因而造成昔日宗教與產婆間和諧關係的破裂，以及產婆間的衝突擴大。義大利產婆與男性醫療者的競爭始於十八世紀末，由於國家與教會間的論

6 Doreen Evenden 是 Trent 大學歷史系助教授。著有 *Popular Medicin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Bowling Green, Ohio: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88); 她的博士論文 "Seventeenth-Century London midwives: their training, licensing and social profile" (McMaster University, 1991) 曾獲得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最佳博士論文獎，即將於 1999 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爭使得問題更形複雜。教會不僅支持產婆，甚至替她們的執業權及道德角色辯護——尤其是她們的施洗角色，而這些競爭一直到十九世紀都未曾停歇(Marland, 1993, pp. 152-170)。同樣地，Teresa Ortiz 舉出，在西班牙，將重心轉至產科及助產術手冊寫作的男性開業醫社群的興起是受到啓蒙運動理想的支持。然而，即使到了十八世紀末已建立了凌駕產婆的合法與教育控制，卻不意味產婆的沒落。在法國，Mme du Coudray 於 1759 年被派至境內各地對產婆再教育，這個例子完全不像是產婆角色沒落的徵候，她是走向十八世紀末的新一代產婆的代表，她身負為產婆同僚向男性產科開業醫對抗的重任。此外，如同 Nadia Filippini 所舉義大利的例子，在許多國家，新接生器械——產鉗(forceps) 對當時醫界的影響，從產婆本身不擅使用這些器械看來，並未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大。這些例子在在顯示了十八世紀產婆在英國以外地區仍有極大的影響力。

第四、除了上述這些共通性外，有些產婆頗具有自己的特色。例如：Chatharina Schrader 在困難度較高的分娩上展現專長。教友派產婆 Frances Kent 在教友及貴族中聲名遠播。西班牙的 Lisa Rosado 展現出醫學權威為她的執業權辯護，並且在難產方面應用她的知識。荷蘭的 Van Putten 姊妹，被授與“vroedmeesteres”的頭銜，意思是「女的男助產士」(female men-midwives)，她們跨越了新舊及女男執業範疇的界線(Marland, 1993, pp. 201-202)。⁷ 至於義大利身為產婆手冊作者的 Teresa Ployant 則汲汲改善產婆執業的水準，以防女性產婆的謙遜特質受男性開業醫的惡習感染。此外，倫敦素有「教皇產婆」之稱的 Elizabeth Cellier，則是近代歐洲最著名的產婆之一，她不僅介入宗教、政治、及醫政事務；而且企圖建立一所產婆學院、名符其實可說是一位橫跨英國助產術及政治圈的爭議人物。由於她在政界及產婆圈享有崇高的公眾形象，因此轉變了不少當時人們對產婆的負面看法（酗酒及淫蕩的鴿母、撒旦之妻）。

7 Elisabeth van Putten(1755-1848)於 1769 年註冊成為鹿特丹外科基爾特(guild)的一名助產士學生，由於當時未有針對產婆的一般性考試，透過她父親當時是基爾特的主席的關係，她參與了助產術的考試，後於 1773 年獲得“vroedmeesteres”的頭銜，允許她在緊急時使用產鉗。她妹妹 Neeltje van Putten 亦在此情況下，於 1783 年獲此頭銜。

另一位具傳奇色彩的是前面提到巡迴法國鄉村重新教育產婆的 Mme du Coudray。目前對 Coudray 的生平研究最透徹的是 Nina Pattner Gelbart⁸ 於 1998 年出版的 *The King's Midwife: A History and Mystery of Madame Du Coudray*。早在 1993 年，Gelbart 就於《產婆的技藝》，發表了“Midwife to a nation: Mme du Coudray serves France”，該文將 Coudray 的「助產術推廣之旅」勾勒出一幅概略的圖像，可視為此書的濃縮版。而《國王的產婆》則採取傳記寫作方式，透過一千多份 Coudray 與官方往來的檔案與信件，重建了一個產婆的生命史——一個沒有自我，完全屬於國家/公領域的女性生命史。

最近的研究顯示，除了英屬美國殖民地外，十八世紀英國的男助產士無論是在數量上或社會地位方面，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當時歐洲其它地區，儘管男性開業醫已獲得新的技術，但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才打破只准處理難產的限制。在此之前，爲了要提高人口數，這些地區政府大多會藉由訓練體系、證照制度及付酬方式，提昇產婆的開業水準，這之中最有制度的就屬法國。1759 至 1783 年間，Coudray 繼 Mme Le Boursier 之後，奉法王路易十五之命，巡迴法國鄉村指導接生技術，創立了一批年輕、未婚，以及受過有系統訓練的產婆，她們的足跡曾遍及全法國。到了 1780 年代，她的學生佔全國產婆數的三分之二。Coudray 的例子相當獨特，從一開始，她就獨自派去進行這些任務，她不僅是位公眾人物，更是位政治產婆。當然，她並非不受拘束的自由進行，在途中，有許多官僚、御醫、宮廷管理者、及國王會不時影響及主導她的行程(Wilson, 1995, p. 5)。

當我們將焦點放在十八世紀的產婆身上時，歷史的景象又呈現另一種面貌，其中對傳統產婆的工作領域衝擊最大的莫過於男性助產士(man-midwife/accoucheur/obstetrician)的出現。

8 Nina Pattner Gelbart 目前是洛杉磯 Occidental 學院科學史教授，著有 *Feminine and Opposition Journalism in Old Regime France: "Le Journal des Dames 1759-1778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lifornia, 1987).

三、從產婆到男性助產士

十八世紀初期前的歐洲，分娩只是一種社會行爲，而非醫療行爲。當時的助產術(midwifery)仍掌控在以女性爲主體的產婆、產婦朋友及街坊鄰居手中，而男性則被排除在外(Loudon, 1993, pp. 1050)。

在她們自家內，產婦們主導大部分生產經驗。她們決定分娩時按自然法則做準備，街坊鄰居在產婦陣痛及分娩時予以協助及安慰。產婆則在家中產房傳統地扮演一個非干預者的角色(Loudon, 1992, p. 166)。

這段引文簡潔地描述了十八世紀前婦女分娩及產婆角色扮演情形。只有當婦女面臨難產(obstructed delivery)時才會找來男性開業醫助陣。但到了十八世紀，出現了一群新的開業醫——「男性助產士」，這些男性開始插足助產士的行列，爲一般正常產婦接生。這批開業醫建構了一套新的知識體系及開創一系列的助產術，其中較著名的有：William Smellie(1697-1763)、⁹ William Hunter(1718-83)，及 Thomas Denman (1733-1815)，史稱這段歷史爲「產科革命」(revolution in obstetrics) (Wilson, 1995, p. 1)。此後，由產婆壟斷接生市場的局面被打破，男助產士開始取而代之；但這只是雙方工作權爭奪戰的開端，彼此的相互較勁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中葉，爾後，接生一職才完全成爲男性助產士的天下。

這種轉變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歷來醫學史家看法不一，Adrian Wilson則是首位將此問題放在社會、政治及文化脈絡下來思考的學者，《男性助產術》一書可說是目前爲止探討此問題最爲深入的專著。他主要處理的時空是1660至1770間的英國（主要是倫敦地區），全書分爲四部分：（一）傳統的分娩處置（二）從婦產外科到男助產士（三）Whig黨和Tory黨的男助產士（四）男性成爲助產士。主旨環繞著以下幾個問題。爲何女性拋

9 William Smellie (1697-1763, 斯梅利)，蘇格蘭產科醫師，曾在農村行醫二十年，之後至倫敦以示範的方法教授助產士及醫學生。他建立了實習醫師參加助產的新教學法，並爲貧婦免費接生。斯梅利曾發明一種產鉗(forceps)，但最馳名的是他對「分娩機制」的描述，著有《解剖圖表》(1754)及《助產術的理論與實踐》(1752-1764)。

棄了傳統的產婆？昔日女性所主導的場域如何轉為男性醫療工作的一環？當時英國社會對男助產士的諸多批判聲浪為何無法引起迴響？新的男性知識與男性工作間的關係是什麼？什麼是打破以往阻礙男性醫療者涉足接生工作的關鍵因素？這種轉變是突然的發展？還是潛伏漸進的呢？Wilson 的研究取向有三：第一，分娩既是身體，亦是社會之事，其範圍有連續性，而非傳統史學所謂是分離的。因此必須置於文化脈絡下來看。第二，重點放在重建十八世紀開業醫們所從事的分娩工作特色，而非論斷其優劣。第三，近代英國女性並非只是她們身體或男性的犧牲者；而是積極地創造她們自身歷史的主人。

以下則從三方面來評介 Wilson 及歷來學者對男性助產術興起的看法：

（一）「產鉗理論」的質疑

1740 年後，男性助產術已有長遠的轉變——從外科到男性助產術，從拔出死胎到接生活嬰。此時由於產鉗的正式問世，已有數百位年輕男子開始學習如何使用這種新器械。儘管產鉗(vectis)仍在 John Bamber 和 Starkey Middleton 手中密傳；但 Deventer 接生法（見下討論）和產帶(fillet)已為大眾熟知。男性已開始接手更多高難度的分娩，緊急傳喚(emergency calls)可以在幾小時內完成。有產婆伴隨的陣痛傳喚(onset calls)已變的更為普遍。隨著系統化、專業化教學及大量醫學手冊的出版，經驗及理論知識已迅速轉由大眾主導，有關助產術的通俗知識已普及至史無前例的程度，

然而，這種新的醫療行為仍包含在舊有形式中，男性助產術並未完全取代傳統的產婆，一般性接生仍大多由產婆負責。產鉗開業醫專職緊急傳喚，Deventer 擁護者伴隨產婆專職陣痛傳喚（或預先傳喚 advance calls），產鉗開業醫則兼顧上述三種。直到 1760 年代，產婆所壟斷的局面才被打破。儘管有上述改變，當時的觀察者仍習用相同的語彙 man-midwife 來描述兩種截然不同的開業種類：一種是補充產婆的舊形式；另一種是取代產婆的新形式(Wilson, 1995, pp. 161-164)。

為何男性助產士能說服十八世紀的廣大婦女信任他們的技術，目前仍是學界爭議的焦點(Moscucci, 1990, pp. 50-51)。以往學者對男性助產士興起

的解釋，大多視爲是受到「流行」(fashion)及「產鉗」的影響(Wilson, p. 3)，¹⁰ 少部分學者則從「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觀念來解釋。後者則主要觀點是：產婆的醫術是傳統的、迷信的；而男助產士則符合現代科學 (Moscucci, 1990, pp. 50-51)，很明顯落入二分法的迷思。關於「流行」的說法：部分史家認爲，男性助產術的傳佈主要經由流行的過程，首先在上流階層風行，就如同喝茶、擁有馬車、吸鼻煙、及帶假髮一樣，而後才經由模仿的過程 (aping the quality)，傳至下層社會。但 Wilson 指出，這樣的解釋忽略了有女性產婆的另類選擇；尤其這個過程是如何開始的？以及是什麼促使了男性助產術的首次流行(Wilson, p. 3)？

至於產鉗的說法：主要論點是產鉗的使用較「頭顱切開術 (craniotomy)」更合乎人情，進而改變了民眾對 surgeon-accoucheur (外科助產士) 的公眾形象。產鉗早於十七世紀初就已出現，卻一直被發明者——Chamberlen 家族密傳而未公開，十八世紀初傳給其他開業醫，其設計則直到 1730 年代才被公開。若光從產鉗的公開時間與男性助產術的興起時間的來看，似乎二者在時序上有其重疊，一般學者因而認爲，產鉗是男性助產術興盛的主要原因；甚至有學者推斷它是產房 (lying-in room) 出現的關鍵 (Radcliffe, 1967, p. 30)。對於上述說法，Wilson 認爲仍有可議之處。他舉出，如同 Margaret Versluysen 所觀察的：「產鉗只用在少數的接生；它不爲母親們喜愛；它的誤用是男性助產術反對者的主要話題之一；它甚至被一些主要的男性助產士所反對」；此外，就連 William Hunter 亦反對使用產鉗。Wilson 進一步追問說，如果這些代表了頗具威望的男性助產術倡導者的態度，我們該如何解釋男助產士的興起與產鉗有關呢 (Wilson, 1995, p. 3)？Moscucci 亦認爲這樣的說法有兩個問題：第一，產科器械從未立法禁止產婆使用。例如，十七世紀的助產士 Percivall Willughby (1596-1685) 在

10 這方面說法的學者有 B. Ehrenreich & D. English, *Witches, Midwives and Nurses: a History of Women Healers*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1973); S. Kitzinger & J. Davis, eds., *The Place of Bi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S. Kitzinger, *Birth at Ho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N. Leap & B. Hunter, *The midwifery's tale: An Oral History of Childbir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Scarlet Press, 1993).

Observations in Midwifery 一書中，就公開呼籲產婆們勿使用代用器械處理產婦腹中死胎；而指導她們如何使用產鉤(crotchet)。¹¹ 儘管如此，到目前為止仍令研究者相當困惑的是，為何大多數的產婆拒絕使用產鉗？第二點則與上述 Wilson 所舉產鉗為一些著名的男助產士反對的說法一樣 (Moscucci, 1990, pp. 47-48)。

(二) 醫療與政治：醫學社群間的競爭

說到近代助產術的興起，就不得不提 Chamberlen 家族 (Peter Chamberlen, 1560-1631；¹² Hugh Chamberlen, 1630-約 1720¹³)，Wilson 不僅點出了早在十七世紀就已有男性助產士的雛形出現；而且提出一個相當具原創性的看法：產科醫療技術特色與當時醫療社群的政治、宗教立場密不可分。這個說法似乎可以解釋為何會有那麼多傑出的男性助產士公開反對產鉗。

從 1720 到 1740 年代，倫敦的男性助產士可分為「Tory 黨的產鉗開業醫擁護者」和「Whig 黨的 Deventer 擁護者」。當時倫敦有所謂 “Deventerians” 學派。該學派是一群以荷蘭產科醫生 Hendrik van Deventer (1651-1724) 為首的醫學社群，Deventer 的助產術著作曾兩度被翻譯至英國，其擁護者大多是男性助產士，他們透過政治結盟，公開反對使用產鉗。Deventer 一方面反對產鉗；另一方面改革接生術。他主張依靠產婦子宮的自然力量，擴張骨盆，以增加收縮。從一開始，Deventer 的倫敦支持者都是反對產鉗的宮廷 Whig 黨，此派的助產術和 Whig 黨的政治忠誠一直緊密結合至十八世紀

11 關於 Percivall Willughby 的研究，Wilson 於 1997 的一篇論文中有更仔細的探討，見 “A Memorial of Eleanor Willughby, A Seventeenth-Century Medicine” (Hunter, 1997), pp. 138-177.

12 原為外科醫生，出生於巴黎，後移民英國，成為著名的助產士。據說約於 1630 年發明產鉗，但並未公開，以便用它為家族牟利。曾為英王詹姆士一世及查理一世的王后助產。

13 英國男助產士，出身醫學世家，其家族成員因發明產鉗而名留醫史，曾為查理二世的王后助產。產鉗自發明以來，一直秘不示人，他則充分利用他在宮中地位以產鉗牟利，1670 年，他在巴黎時想將這種新器械獻給法國政府，索價約 3800 英鎊，但未成交，最後他將產鉗賣給荷蘭外科醫生。1672 年，他將法國著名外科醫生莫里索的助產學著作醫成英文，該書後來成為產科學教科書達 75 年之久。

中葉。產鉗剛開始大多只在 Tory 黨中流傳，因為，這不僅涉及利益的交換，亦牽涉到透過政治忠誠達到保證產鉗技術不傳外人的可能，因此產鉗幾乎完全是由支持 Tory 黨的開業醫所壟斷。兩派的差異是：Deventer 學派大多是內科醫生，都是從事預先傳喚(advance call/onset call)的接生，且有產婆在旁協助；而 Tory 派則做緊急傳喚(emergency call)。

除了政治立場不同所引發的醫療社群的醫療特色外，男性助產士介入接生職場的過程中，是否會因為性別差異而引起女性的反彈呢？或者說，產婆與男性助產士之間有無因為產鉗的介入分娩過程，而有所競爭？關於這點，Wilson 文中似乎沒有深入探討。不過，從部分資料來看，產鉗公佈之初，的確受到一些視助產術為外科一部份的外科醫師的攻訐，John Douglas 就是一個例子。但他們反對的是產鉗的使用；而非反對男性助產士。為何這些外科醫師會支持產婆，而反對使用產鉗？Wilson 的解釋是，它打破了產婆和外科分工的平衡狀態。換句話說，傳統上，產婆負責接生活胎，外科醫師處理死胎，這種界線使二者保持某種和諧的局面；一旦產鉗的大量使用，外科醫師所擅長的難產接生術將受到挑戰(Wilson, pp. 110-118)。

由此可見，十八世紀中葉男性助產術的興盛過程，不單只是單純的醫學技術的發明及影響，在它被社會接受的過程中，其實蘊含著醫學社群間的政治、宗教立場及性別差異等複雜關係。

(三) 新女性文化的出現

假使不是產鉗因素，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男性助產術的盛行呢？Wilson 另一個相當具有創見，卻引起學界爭議的看法是：因為上層社會婦女將男性助產術大眾化的緣故。

他進一步解釋這是因為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出現了一種新的、流行的、能讀寫的、休閒的女性文化(female culture)或女士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ladies)，例如：女性識字率的提昇、家內活動商業化、女性閱讀群的擴大、及女作家的出現。這些新女性文化取代了傳統女性的集體文化。由於傳統的分娩是一種女人間的儀式性活動，它賦予了產婆在生產過程中的權威。產婆、產婦及街坊鄰居婦人的小道消息(gossips)所構成的生產文化，可算是

傳統女性集體文化中的一部份，一旦新的女性文化出現，造成傳統女性文化的斷裂。昔日屬中等階層的產婆因較一般婦女有更高的識字率，才得以有機會成為地區婦女中的領導者；一旦女性識字率提高，產婆昔日的種種優勢自然不易維持。易言之，Wilson 認為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尤其是倫敦，由於出現了上述新女性文化，才使得新的助產術——男性助產術得以迅速竄起，男性助產術的出現可視為是當時文化轉向的一個面向。表面上，雖然 Wilson 批判了以「流行說」解釋男性助產術現象的說法的不足，但實際上，他依然是在「流行說」的架構中找尋答案。所不同的是，他認為唯有將問題放在新女性文化的脈絡上，才能瞭解「流行」的角色如何賦予男性助產術必要的動力。「流行」提供了那些中下階層的婦女能夠跨越階級界線，以及模仿上層婦女特性，助產術因此成為一種炫耀的消費類型 (Wilson, 1995, pp. 185-192)。

總之，Wilson 認為分娩革命始於婦女，而非醫學人士。分娩從女性主控轉變至成為醫學一部份，自有其特殊的歷史，因此不能視為醫學特色的轉變。男性開業醫轉換舞台成為助產士，非他們自身的意願，而是女性選擇後的結果。易言之，男性助產術的興起無疑只是女性主動的成果，而不能視為是「分娩的醫療化」。

關於 Wilson 的這項推論，他所根據的是近來十八世紀中葉英國都會地區新女性文化的研究成果，這點無庸置疑；但將它與男性助產術的興起作某種聯想，似乎過於牽強，作者並未有直接的證據來證實這項說法。著名英國醫學史家 Irvine Loudon¹⁴ 對 Wilson 的說法則持不同見解。首先，他覺得 Wilson 將男性助產術的快速成長解釋成因為上層婦女的需求，根本就犯了「消費導向」的偏見；而忽略了「提供者角色」。Loudon 認為那只是部分因素，無論我們是否相信這項假設，似乎不能忽略十八世紀的醫學科學（例如解剖學）對男性助產術形成的貢獻，而 Wilson 明顯地將十八世紀醫學的發展排除在外。因此，Loudon 認為分娩的科學知識的進步才是男性助產術的興起及快速成長的一項重要因素。

14 Irvine Loudon 的著作主要是研究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母親分娩和死亡率關係。

其次，根據 Wilson 的理論，男性助產術在鄉村快速成長是由於婦女——妻子的要求。他認為 Wilson 應該註明這些婦女是勞工、工匠、零售商、及農夫家庭身份等等，而非富有女性。Wilson 的假設是這些女性受到倫敦有讀寫能力及富家女性相當程度的影響，以致於她們說服家庭醫生——外科治療者(surgeon-apothecaries)採用新的醫療技術。Loudon 認為這似乎是個不可駁斥的說法，但聽起來不太具有說服力。他認為較有可能的是，從事男性助產術的外科治療者經常參與助產術課程，主動讓人們知道他們可以受雇，以及他們能夠替代產婆作預約接生。如同十八世紀著名的產婆 Sarch Stone 所觀察到的現象，當她於 1730 年代到 Bristol 時，卻發現：「幾乎所有的年輕男子都拜外科醫療者(barber-surgeon)為師，而希望成為一位男性助產士。」這意味著由年輕的醫療工作者扮演積極的角色；而非只是被動地回應女性的需求。因此，男性助產術興起的主因之一應是外科治療者在產婦「陣痛傳喚」時提供了產科技術。對他們而言，他們深信她們是較「無知的產婆」更安全的接生者，而且他們應當對產婦灌輸這種觀念(Loudon, 1996, pp. 513-514)。

最後，Loudon 認為男性助產術的形成有許多同時存在的因素，它們缺一不可。例如：對懷孕及分娩科學的瞭解，女性文化的改變導致女性需求的增加，以及男性助產士在各方面成功說服了女性接受開業醫。換句話說，若沒有新而普遍的分娩知識，男性開業醫就無法選擇或涉足新的醫學領域。若男性助產士沒有可介入產婆工作場域的知識及能力，就不可能出現符合女性需求的接生。若女性要求男性助產士接生的意願沒有增加，就不可能有如此先進且快速的男性助產術的出現(Loudon, 1996, pp. 514-515)。Loudon 與 Wilson 的說法兩相對照下，我們可以發現 Loudon 的見解似乎較能自圓其說，亦提供了許多新的思考方向，至於誰的說法較具說服力，則有待學者未來繼續追蹤倫敦以外地區男性助產士的發展，以及他們與產婆的互動情形。

儘管爭議不斷，但無疑地，《男性助產術》將會是未來學界繼續探討相關問題時，一本不可或缺的參考著作。從 Wilson 的書出版至今，已出現

不少相關的著作及論文，可見，未來這方面的論題仍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¹⁵ 例如，英國的男性助產術在當時真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嗎？假若如此，為何英國的男性助產術發展未能對歐陸其它國家造成影響？這是文化特色的不同？還是有實際上的醫學因素？假若不是，倫敦以外地區的男性助產士又有何特色？這些都是相當值得探究的問題。

四、結論：西方醫學史對中國「女性與醫療」史研究的啓發

相較於西方「女性與醫療」課題在醫學史與性別研究領域中所受到的重視，漢學界對這方面研究就顯地落後許多，不僅缺乏通論性的著作，就連專論亦相當不足。若依文章性質來分的話，就目前筆者所見，這方面著作大致可區分為以下四個部分：(1)醫學知識中的性別建構、¹⁶ (2)生育文化與醫療、(3)女性醫療照顧者、(4)女性與疾病。¹⁷ 究竟本文所評介的三本書對中國醫學史的「性別與醫療」課題有何啓發？我們可從研究方法及問題意識兩方面來看：第一、就研究方法而言：上述三本書基本上都是從社會史式的醫學史角度出發，¹⁸ 探究歷史事實的真相才是他們所關懷的重點，因此西方醫學史研究中傅科式(Foucaultians)的文化史研究取向及女性主義觀點，在這些著作中並未受作者青睞。其次，這三本書都跳脫出以二分法（傳統/現代、迷信/科學、不衛生/衛生）的框架來評斷產婆與助產士或產科醫師的優劣。當我們對傳統中國女性醫療照顧者的認識仍嚴重不足時，這兩點似乎頗值得我們借鏡。尤其後者對我們重新檢視近代產婆的發展，

15 例如，最近即將要由劍橋出版社出版的 *The Midwives of Seventeenth-Century London*，就是 Doreen Evenden 有關近代英國產婆的一本力著。

16 例如 Charlotte Furth 近十年來一連串有關中國近代醫學與性別關係的研究。尤其 1999 年剛出版的專書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更是這方面的代表著。有興趣者可參見張哲嘉於本刊所寫的書評。

17 筆者目前正在撰寫〈傳統中國的「性別與醫療」史的回顧與展望〉，文中將針對這四部分，作更詳細的討論。

18 這方面的研究取向，見 Dorothy Porter, "The Mission of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 Historical View," in *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1995).

頗有助益。有時傳統與現代並非是斷裂及相對立的，二分法的迷思的確造成我們過度相信近代西方醫學的發展對分娩行為及接生技術的影響。

第二、就問題意識來看：以「女性醫療照顧者」為例，目前漢學界有關這部分的研究，時代上，大多集中在明清（Victoria Case、Charlotte Furth、Christopher Cullen、梁其姿、衣若蘭、吳一立），少部分是漢唐間（李貞德）及日據臺灣（游鑑明）。研究主體大多以傳統產婆、乳母、及女醫為主，少部分是近代臺灣助產士（游鑑明）與戰後助產教育（張淑卿）。或許是受限於史料的緣故，要深入探究傳統中國女性醫療照顧者的歷史，難免常有支離破碎之感。中西歷史發展不同，本文所評介的三本書的問題意識並不完全適合套用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上，但仍有參考之處。例如：西方產婆自十七世紀後，逐漸擺脫女巫的污名，而中國自宋以來，產科醫學的發展對產婆在執業及形象上有無影響？十八世紀英國與歐洲各國的產婆雖有共通處，但各國亦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強調地域性的差異，是上述三書的共同特色；反觀中國，是否地域性的差異亦反映了產婆接生技術特色的不同？則有待進一步分析。此外，相較於助產術在西方十八世紀以來的蓬勃發展，中國助產術的醫療化則要晚到民國以後，更加凸顯了民國時期這方面課題的重要性。醫療化的分娩行為是如何展開？產婆如何受到西方醫學的影響，開始進入醫學體系接受正規的醫學訓練？國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新舊產婆間的競爭呈現何種局面？產婆的地位是如何被男性醫者所取代？社會大眾對助產士及產科醫師介入分娩的反應又是如何？有關中國近代女性醫療照顧者的研究，目前只有以研究台灣婦女史著稱的游鑑明曾經討論過日據台灣的產婆，而民國時期的這方面問題卻少有人碰觸。因此，如何一方借鏡西方醫學史的研究成果，同時發掘新材料及開發新課題，應是當前中國「女性與醫療」史研究亟需解決的問題。

附記：岳母高金錠女士一生熱心助人、克盡母職，1960至1973年曾在福建南安官橋醫院擔任助產士一職。1973年舉家移民香港，因大陸助產士執照不被英政府承認，而轉至工廠任職。1993年元月來台參加女兒婚禮，卻因腦血管破裂，不幸病逝於林口長庚醫院，享年六十，謹以此文表達我與妻紫瑜對她的愧疚與懷念。

參考書目

一、西洋醫學史方面：

- Adrian Wilson, *The Making of Man-Midwifery: Childbirth in England, 1660-177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Anne Llewellyn Barstow, *Witchcraze: A New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Witch Hunts* (San Francisco, CA: Pandora, 1996)
- David Harley, "Historians as demonologists: the myth of the midwife-witch,"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3 (1990) : 1-26.
- Diane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Earley Modern and Twentieth-Century Represent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Feanne Achterberg, *Woman As Healer* (Boston: Shambhala, 1991)
- Fohanna Geyer-Kordesch, "Women and Medicine," in W. F. Bynum & Roy Porter, eds.,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1(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idge, 1993), pp. 888-914.
- Hilary Marland, ed., *The Art of Midwifery: Early Modern Midwives i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Irvine Loudon, *Death in Childbirth: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Maternal Care and Maternal Mortality 1800-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Childbirth" in W. F. Bynum & Roy Porter, eds.,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1(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idge, 1993), pp. 1050-1071.
- , "The Making of Man-Midwiery" in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70 (1996) : 507-515.
- Jean Donnison, *Midwives and Medical Men: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Childbirth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1977, reprinted 1993)

Lynette Hunter & Sarah Hutton, eds., *Women, Science and Medicine 1500-1700* (Sutton, 1997)

Nina Rattner Gelbart, *The King's Midwife: A History and Mystery of Madame Du Coudra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Ornella Moscucci, *The Science of Women: Gynaecology and Gender in England, 1800-192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oy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二、中國史方面：

(一) 中文：

衣若蘭，〈從「三姑六婆」看明代婦女與社會〉（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7）。

李貞德，〈漢唐之間的女性醫療照顧者〉，《臺大歷史學報》第23期（1999）。

游鑑明，〈日據時期台灣的產婆〉，《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期（1993）。

——，〈日據時期台灣的職業婦女〉（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1995）。

張淑卿，〈專業、權力與教育：護產專業的變遷與助產教育的停辦〉（第五屆全國歷史學論文討論會，1999）。

(二) 英文

Angela Ki-che Leung (梁其姿), "Women practicing medicine in pre-modern China," in H. Zurndorfer, e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Women in Mid-to-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forthcoming).

Charlotte Furth, "Women as healers in Ming dynasty China," (Manuscript,

1996).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Christopher Cullen,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i," in *History of Science* 31.2 (1993) :
99-150.

Victoria Case, "Female healers in the Ming and the lodge of ritual and
ceremony,"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1
(1986) : 233-240。

Yi-li Wu (吳一立), "The Doctors of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and
Popular Gynec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98)